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笔走龙蛇

陈思和 著

Chen Sihua

B
I
N
D
I
N
G
S
H
E
E

山东友谊出版社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笔走龙蛇

陈思和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5插页 300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51—952—8

I·190 定价: 15.80元

目 录

序：重建象牙塔 (1)

第一辑 《反思与重构》散论

“五四”与当代 (3)

——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

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 (24)

[附录] 关于读《胡风评论集》的一封信

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 (57)

文学创作中的现代反抗意识 (77)

[附录] 再论“现代反抗意识”

关于“重写文学史” (106)

[附录] “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对话

第二辑 《海上文谈》笔记

关于“海上文谈”的一封信 (155)

《随想录》：巴金晚年思想的一个总结 (158)

《金瓯缺》：对时间帷幕的穿透 (181)

笑声中的追求 (197)

——沙叶新话剧艺术随想

赵长天的两个侧面：人事与自然 (209)

近于无事的悲哀 (223)

——沈善增小说艺术初读

告别橙色的梦 (234)

——读王安忆的三部小说

[附录] 两个 69 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第三辑 《批评与想象》残墨

我与批评 (271)

从批评的实践性看当代批评的发展趋向 (279)

略谈吴亮的批评 (292)

略谈蔡翔的批评 (301) .

声色犬马 皆有境界 (312)

——莫言小说艺术三题

[附录] 关于《红高粱》的对话

换一种眼光看人世 (343)

——赵本夫小说初探

在社会理性的准则之外 (354)

[附录 1] 关于《悬挂的绿苹果》的对话

[附录 2] 关于《叶兆言文集》

《北京人》：从形式到内容的挑战 (375)

关于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的通信 (382)

台湾版序跋 (414)

新版后记 (422)

第一辑 《反思与重构》 散论

●笔走龙蛇

●通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五四”与当代

——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

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于今已 70 周年。在 20 世纪社会文明的发展节奏中,70 年时间不能算“弹指一挥间”了,无论是个人还是一种文化现象,经过 70 个春秋暑寒的磨难都难免会变得老迈。可唯有五四新文化却依然发出生气勃勃的魅力,并始终指导和制约着当代学术的基本走向。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最初的启蒙对象是一批刚刚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的教育体制,新文化依着它的思想原则和求知方式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

子。“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一位著名作家的自白概括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性质。尽管这期间发生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和一场国家内乱，扰乱甚至改变了新文化的进程，但未能真正地突破它的文化体系。即便是它的对立物，也只能来自它内部的某一翼文化宗派。一旦对立物被消除，中国文化的走向必然地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上。所以五四新文化依然是当代学术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等方面的源泉。

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当代学术正在继承与发扬“五四”的传统，继续着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五四”给人的新思想和新精神是一种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传统直接相对抗的，与现代文明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思想武器；知识分子只有依傍着它才有力量同历史的、现实的封建专制势力作战。这样，“五四”就成为知识分子的偶像和保护神。当我们不时听到“‘五四’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民主与科学依然是当代文化的主题”，“现在要进行一场新的启蒙”等等的话题时，我们不能不感受到“五四”文化的生命力。但是，如果离开这样一种思路来看问题，就会感到当代学术仅仅在重复“五四”的原则和“五四”的道路，或者说，连重复也未达到彻底的程度，更不要说从根本上突破原来的学术格局了。再对照 20 世纪世界文化丰富发展的格局，便会发觉这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萎缩的现象。本文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当人们都在纪念“五四”，发扬光大其精神传统的同时，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过去了的文明，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即 70 年前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中国文化的一场试验，剖析它的本体意义和历史局限，从而让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步走出

“五四”留下的精神遺產，在更大的學術範圍中重新認識與發展中國當代文化。

“五四”：一個基本的判斷

“五四”是一個概念，它籠統地概括了中國在20世紀第二個10年中發生的三次文化現象，也可以說新文化的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1915年《新青年》的創辦為標志，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孔教倫理思想，開始了思想啟蒙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第二個階段是以1917年《新青年》北遷北京，陳獨秀掌北大文科學長，使刊物的社會性與高等學府的學術性結合起來，並以發表胡適之的《文學改良刍議》為序幕而開始了文體革命，在語言形式上落實新文化的啟蒙意義，進而帶來了新文學運動；第三個階段是以1919年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為標志，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五四運動。對於這最後一個階段的五四運動，過去曾有一個時期把它說成是“十月革命”的影響所致，賴有它才普及、擴大了新文化的成果，並從思想上、組織上為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好了準備，因此這一階段的“五四”才是最高，最有意義的“五四”精神。但近年來學術界漸漸轉向了另一種觀點，即以為發生在70年前的這場學生運動並無太大的意義，更重要的應是1915年開始的思想文化革命。學生運動不但沒有擴大反而縮小了它的思想成果的意義，使一場思想革命轉化為具體的政治革命，這才導致了“民主與科學”的任務最終未能完成。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片面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階段之間有着完整的邏輯。中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行為性，任

何理论体系最终都不是上升到形而上领域，而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完成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深入下去，必然会落实到它的表现形式——文体的革命，有了通俗的文体来进行思想启蒙，也必然会进一步落实到人的行为，使之成为一种行动哲学。所以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正是新文化宣扬“民主和科学”的必然结果。“民主”就是反对专制，是一种新的治国精神和治国原则。按这种原则，每一个公民都理所当然要参与国家大事，都要以真正主人翁的态度去关心政治，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监督国家统治者的放任行为。这场学生运动通过知识精英的干预来制止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正是新文化运动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诚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一场爱国学生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使原来的思想运动转向具体的政治运动；文化启蒙的原则改变成实践革命的原则，缩小了新文化运动的原有意义。这也是事实。由于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的学生运动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假定真是后一个“五四”改变了前一个“五四”的走向，那也只能是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矛盾和局限所致。

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但反映了当代学术对其文化根源的认识，还影响着它的未来发展走向。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李泽厚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观点^①，作为一种描述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探讨不应该浅尝辄止，启蒙是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使命，但未必就是最高的使命，何况启蒙也有各种层次的内容。启蒙不是抽象的，启蒙思想往往是对时代主题的理论概括。在中国，晚清时候表现为宣传保种救国、反满反帝的思想；在“五四”时期表现为提倡

民主与科学，以及爱国主义的思想；到了30年代，也就从反帝爱国一路发展为救亡意识。与其如李泽厚所说，30年代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倒毋宁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意识本身就包含了走向它的反面的因素。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的局限之一。虽然已经过了70多年，但这种局限似乎还支配着当代学术，以致使复兴五四新文化初期的启蒙主义，仍然成为当代学术精英们最关注的课题。

在许多推崇五四运动的人看来，这场旨在反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的运动无疑揭开了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在中国历史上堪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有许多“五四”精神的阐释者都是这样认为的。譬如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演说中就直接把“五四”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②。他举例说，当时北京大学有个很著名的刊物《新潮》，其英文译名为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的意思，可见当时一般新文化提倡者的想法。当然胡适还用一些其他方面的实证材料，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是由但丁等统一国语来比附中国的白话文运动等等。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从“五四”开始提倡人文主义（即“人的文学”）个性解放（即表现自我），都是从欧洲文艺复兴的传统中来的。

然而令人扫兴的是，如果不是一厢情愿的愿望而是从实际材料的比较来考察，“五四”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无法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联系的。在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其意为再生的意思）的提法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对中世纪教会文化的同时，继承并发扬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生命内核。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指出的：“拜占庭灭亡时抢救

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③恩格斯指出了—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些重见天日的古籍文献和古代雕塑不仅仅充当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反教会文化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它们的丰富内涵直接启发、唤起了意大利人的智慧和力量。当时努力摆脱中世纪文化桎梏的人们“不能立刻和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找到理解这个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的途径。它需要一个向导，并在古代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向导”。^④这些古代文明的传统都是与中世纪教会文化相对立并被长期埋没的，都是发自西方文化的生命内核，它们的复兴使人们超越中世纪直接看到真正辉煌的西方文化本体。这种被文艺复兴所焕发出来的西方文化精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精神，即对自然奥秘的渴求与探索的精神；另一个是自我的发现，从审美意义上认识自我的价值，进而转化为对个体生命的美好认识和自由渴望。

科学的精神与自由的精神都是中世纪教会文化所极力扼杀的。基督教文化缺乏对自然现象的兴趣，更加漠视个体生命的意义。恪守宗教、一心想着天国的教徒们把对自然与自我奥秘的探索权利奉献给上帝，造成了西方古代文化的断裂。所以当希腊的古代文明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真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一书的作者亚·沃尔夫就是这样说的：“近代科学在它的早期阶段，更加具体地得助于古代流传下来的天文学、数学和生物学论著。”他另一个论断更值得注意：“新

时代所承担的许多任务（指科学技术——引者），古代人大都早已注意过了，只是在中世纪遭到漠视。因此，新时代也不得不几乎就是接着古代人继续把这些任务搞下去。”^⑤自然这些任务中包括了古希腊时代已经奠定了基础的数学（欧几里德、阿基米德、阿波洛马斯等人的数学成就）、天文学、静力学、光学、磁学电学以及化学等。这些科学成果不但作为一笔遗产，而且作为一种在绝对意义上对知识的探求精神，为文艺复兴以后的哥白尼、伽里略……一直到牛顿等欧洲科学家所继承，推动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发达。另一方面，古代希腊崇尚人体的风气通过出土的雕塑艺术也给万分惊讶的基督教徒带来了雷霆般的启迪，使他们从自身的原罪意识中震醒过来，终于发现了人体是美好的，男性胴体的强壮肌肉和女性胴体的柔和线条，从美学上启发了人们对自我的崇拜和珍爱，从精神上真正地感受到个性的无比美好与人的至善至上。于是就有了表现人体美的艺术和诗歌，有了达·芬奇无限神秘的《蒙娜丽莎》和米开朗琪罗充满伟力的人体雕像。科学的精神与自由的精神在意大利文学上表现得最鲜明的，前者是但丁的《神曲》中所体现的对地狱、炼狱、天堂等经验外的世界的求索态度，后者有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描述的人间享乐主义。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巨人们都既是反传统斗士又是伟大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在致力于攻击现时的传统（中世纪教会文化）的同时，又牢牢地站在文化传统所根植的土壤上，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和文献的翻译。在这场复兴运动中，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传统发生了沟通和融合，由此产生出无限的生机，促使了欧洲近代文明的腾飞。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缺少这一点精神。新文化的

产生基本上是得助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它始终没有把现时的文化传统即封建文化和历史的文化传统即中国文化的本体相区别；没有认识到 5000 年以上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与 2000 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区分。因此，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在扬弃否定中国封建文化过程中始终没有找到民族文化的根本力量。尽管有胡适、顾颉刚、俞平伯、鲁迅等人整理过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的历史，但其基本态度是以近代文明的科学态度来重新整理、解释旧籍，他们真正是从古代文献中寻求为自己的改革作理论依据的武器——如胡适，就是从古代作品中找出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的正宗地位，而没有从中国文化的生命内核中找到什么“向导”式的内容。

当时具有文艺复兴意识的只有王国维与郭沫若。他们都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转向古代世界的研究。王国维是学者，他从当时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出古代社会的存在，这无疑是文艺复兴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郭沫若是诗人，他从泛神论进到世界文化一体论，自觉地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放置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考察，并从中国三代以上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艺术诗情。但郭沫若毕竟是从诗人的直觉上感悟到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相沟通的重要，毕竟只是用近代欧洲文明的精神主观地猜测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内核。他没有找到科学的途径，把对文化内核的探求与当时陆续发现的考古学上的出土材料结合起来，使之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两位文化先驱后来都被政治力量所困而中止了学术上的探索，他们的学术成果只是在考古学与文学上确立了地位，没有在现代文化史上发生影响。因此，虽不能说“五四”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但“五四”确实没有复活古代文化的积极的生命

内核。它否定了封建文化因素，但没有更为坚实地在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找到立足点，或者说，它没有将当时的民主革命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精神贯通起来，这就造成了一代文化的无根状。

当然，新文化自有优于旧文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受到了西方新思潮（或者说近代文明）的洗礼。但是，从当时支配新文化运动的主潮——《新青年》干部们的基本思想水平看，与其说五四新文化指导者们的宏篇大论中引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内涵，倒不如说，他们真正关注到的是欧洲的大革命及其思想源泉——启蒙主义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一场过于仓促的资产阶级推翻帝制的革命之后，这场革命用枪炮所决定的和尚未决定的主题都需要通过理论形态给予展开，因此，新文化最初阶段带有明显地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补上思想文化课的使命。是为了这样的使命，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才去寻找思想武器和哲学方法。

在这种背景的限制下，首先引起新文化倡导者们兴趣的自然还是法国 1789 年的大革命和俄国 1905 年的民主革命。陈独秀本人极为重视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意义，他曾评价说：“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他认为近世欧洲三大文明——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均源于法国大革命。“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在同一期刊登的《敬告青年》上，陈独秀提出 6 条青年努力的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

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义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也都是来自法国大革命思想和启蒙主义思想。当他在这篇相当于发刊辞的论文里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⑥，正式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时，他已经把这一场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视作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对新文化所作的这种选择是自觉的，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失败，痛感到民主思想没有深入人心是革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于是筹划创办《新青年》。他相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⑦因此，虽然清末革命党的刊物上也有不少介绍法国大革命和俄国民粹党人活动的宣传品，但自《新青年》始，这种介绍才带有明显的启蒙意义。从《新青年》等刊物当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看，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民约与邦本》，以及稍后发表在《新潮》上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罗家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谭鸣谦）等，基本思想无出其上者。唯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才在新的参照系下，开始超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民主与科学的主题，直到二三十年代仍然是思想文化界基本主题。由于这种政治革命的补课，必然造成启蒙思想的准备不足，实际的、功利的、政治的意义大于思想启蒙的意义，在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已经形成，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救亡的主题。

即便是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性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在欧洲，启蒙运动直接上承了15世

纪开始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才第一次从文化史的角度肯定了文艺复兴的意义，他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并把它的辉煌成就归功于意大利人的创新精神。伏尔泰的解释本身反映了启蒙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的联系。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也同样应和了文艺复兴中人的个性夸张和自由精神。由文艺复兴运动中恢复了的西方文化的求知精神，推动了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一直到牛顿的科学发现，而这些科学成果又反过来帮助启蒙时期的欧洲哲学进一步摆脱教会影响，确立一种以科学实证精神与逻辑推理精神相结合的新方法论。启蒙运动既是思想运动又是哲学运动，半个世纪以后，它又从思想上诱导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因此在欧洲，启蒙的轨迹是文艺复兴→启蒙→大革命；而在中国，新文化的启蒙不是从哲学上和科学上继承文化传统，而是作为一场大革命的补课去寻找哲学上、科学上的依据，它的轨迹成了辛亥革命→启蒙任务→新文化运动，其顺序是逆向的。这就使它一旦抓住了欧洲大革命体现的民主精神和上溯到启蒙时期提出的《民约论》等思想以后，再也没有进一步上升到文艺复兴，更没有获得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经过了几百年人文精神的缓慢发展，才导致了欧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尽管目标是政治的，精神却是人文的。大革命中平等、博爱、自由的口号，既体现了对封建贵族的社会等级制的反抗，也倡导了一种以人权为根本的自由原则。在中国虽也有人提出以个体生命为根本的思想，但很快就淹没在一片救国试验的方案中。早在1908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搃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尽